



足球:古典戏剧的一种技术性复制

路云亭

摘要: 现代传播技术改变了包括足球在内的诸多竞技体育项目的本来面貌,并打造出了一种为数众多的镜像足球观众群。原本真实的足球赛事开始出现了虚拟化现象。从公共空间话语的角度看,足球已成为一种替代古典戏剧的主要游戏、聚会和仪式形态。现代实体足球和镜像足球都很像一种现代版的悲剧,而悲剧的内涵来自古希腊的经典悲剧家的集体理念。足球是经典悲剧的现代形态,而世界杯则是一种浓缩版的悲剧形态。

关键词: 现代足球;悲剧复制;世界杯;空间转移;动作宗教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7)04-0008-08

DOI:10.12064/ssr.20170402

Football: a Technical Reproduction of the Classical Theatre

LU Yunt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The Center for Sports, Media and Cultur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nature of many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football and ha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mirrored football audience. Virtualization phenomena appear in original real football games. From the aspect of public space discourse, football has replaced classical drama and has become a kind of game, gathering and ritual. Both entity football and mirror football are very much like a modern version of tragedy. Whil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gedy comes from the collective concept of the ancient Greek classical tragedy writers. Football is a modern form of classical tragedy and the world cup is a condensed version of tragic form.

Key Words: modern football; tragic replication; the World Cup; space transform; action religion

现代传播技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包括足球在内的诸多竞技体育项目的本来面貌。许多人终生未曾到足球场看过球,却仍然是一位坚定的球迷,由此可见,足球的传播方式已经越来越重要,它甚至可以超越足球的本体形态,体现出和实体性足球竞赛近乎同等的重要性。电视和网络媒介已经培育出一种只看荧屏和视频的足球赛事接受者群体,它导致一种对真实的球场赛事的虚拟化倾向。现代传播集团的介入,扩大了以足球为代表的大型竞技项目的精神内涵,而足球之类竞技项目的宗教本性本来就很大,高效度的传播本身所带来的市场化效应又时常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理震动力。足球赛事本身充满了悲情因素,它承载了希腊悲剧中的基本精神,也携带有现代戏剧的多悬念的特质,而现代媒介对它的扩张性传播则会强化其中的戏剧性。

1 足球的镜像性活力来自人们对传统戏剧的延伸性想象

足球如戏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这种说法在很长的时间内尚处于一种喻体的形态,并无多少绝对严谨的科学意义,因为人并非一直生活在一种有趣味的状态在中,而任何一种惊悚性的新闻报道、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八卦常识之类都可以成为一种喻体,并产生相应的信息扩张力。然而,足球如戏的说法很快就超越了寻常的意义范畴,跨越到一种高度理性化、科学化和学科化的境地,甚至会时常越过诸多的矛盾纠葛层面,直接演化为一门值得探究的新型学科,这里权且称之为足球戏剧学或足球观剧学。

足球是否可以成为戏剧?关键在于足球是否有一种类似戏剧的脚本、导演、编剧之类的元素。因为

收稿日期:2017-05-30

作者简介:路云亭,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传播。E-mail:luyunting666@sina.com。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现在绝大多数的戏剧都有脚本、导演、编剧,而包括足球在内的诸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无脚本,更没有导演和编剧。且以脚本为例,这里所说的有脚本的戏剧仅仅指的是近现代的戏剧,远古时代的戏剧以及一些现代剧也没有脚本。换言之,脚本原本并非戏剧的专利,而足球也并非完全没有脚本。人类各民族的原始戏剧从未有过脚本,而足球的脚本可能就是规则、传统、仪式、空间聚会礼仪之类。美国人类表演学家谢克纳在评述印度戏剧时说:“在罗摩那迦尔(Rammnagar)的印度最著名的《罗摩利拉》中,演出的导演们(vyase)站在表演者身后,打开受众提词用的剧本,朗读台词和动作来确定一切都按照剧本所写发生了。有意思的是,演出的导演们的出现(甚至介入)使得罗摩(Rama)或猴神(Hanuman)的动作实在不太‘真实’,《罗摩利拉》的观众并不为此烦恼。显然罗摩和猴神的‘现场’与演员的‘现场’交叉但两者又各不相同。……在《罗摩利拉》中,演出的导演们的动作也是表演的总谱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是按需中断,且不可预料——就像裁判在发生犯规时中断足球比赛,干预并在比赛中充当决定性和明确的角色一样。”^[1]谢克纳的这段话里透露出很多超戏剧的信息,同时也揭示出了足球赛事中的丰富多彩的表演性内涵。

足球的表演性体现多个层面。在动作教育、行为示范、规范性创造的意义上看,足球更像戏剧,球员如演员,而裁判或教练俨如导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过导演的角色。如果要阐释清楚足球的戏剧性,则首先要说明足球如何不是或不像戏剧。用于说明足球不是或不像戏剧的证据有很多。由裁判导演的足球大戏显然缺乏真实性,而由教练、球员或媒体导演、表演或编辑出来的足球之戏同样很难为人接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裁判在足球竞技中的独特性内蕴,裁判成为球场的主角更令人失望,它直接导致足球的异化,体育从业者一向对此持批评态度。“今天的竞技运动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文化活动,裁判员的公正执法和艺术判罚保证了竞技运动精彩表演,代表了竞技运动的整体健康形象。裁判员需要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熟悉和准确掌握竞赛规则,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做到正确理解和运用规则。同时,裁判员的执法具有艺术性和应变性,需要控制不断变化的竞赛场面,掌握竞赛表演的节奏,使得整个比赛过程张而有序地进行,让观众欣赏到最佳的满足。”^[2]这里显示出一种对既有体育项目的尊重意向,作者有意无意地离间了足球和戏剧的关系。

足球本身是规则的产物。通常而言,规则是一种限制性力量,但足球的规则却在激励创造性,这便形成一种悖论。于是,足球便在创造与犯规、守成与灭亡、求生与平庸的系列性矛盾体中生存。就目前规则体系下的足球而言,它的确是一种创造学,人们可以历数出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罗纳尔多、梅西等超级巨星,认为他们的诸多动作都带有创造性。足球创造性的动机来自对胜利、荣誉的追逐,也包含着炫耀的潜在意义。同时,足球也从未放弃对奇迹的追求。一旦足球赛事中出现了奇迹,这种奇迹很快就会超越大众表演的界域,演化成为一种媒介事件,或直接变成另外一种新的危机,因为奇迹属于一种炫技现象,而足球是竞争的游戏,一旦有巨星抢夺了其他球员的光芒,一定会刺激对方防守型球员的血性,而一些原本温和的防守型球员为了昭示一种个体价值,也会对杰出的进攻型球员实施更为严厉的防守,其中包括了诸多的犯规性行为。迄今为止,足球领域中的超级巨星都是进攻型球员,而这些球员终生面对的只有两类人,其一是守门员,其二是防守型球员,而后者对进攻型球员的人身安全更有威胁。

足球的规则是一种游戏性规则,它旨在保护人类自幼年时代就萌生出来的一种基本的求生性、仪式性和象征性能力。足球追求的是强烈的现场感、动作感和趣味性,主张在游戏中展示人生的终极意义。仍需说明,足球是集体项目,足球并非纯然的由个别球星的作秀表演主导的游戏,足球之美来自一种多元性的技战术的组合,足球美学也就此呈现出一种群体性、宏伟性和开放性。足球不可能成为封闭空间内的一种修炼术,它只能生长在大众视野之内,除此以外无法另觅出路。质言之,足球是一种终极性的群体间的对话行为,舍此以外足球将丧失其本性。因此,足球中的个体求炫和群体求胜的矛盾始终存在。

还原到传播学的领域,足球的超体育价值会有更多的展示维度。受到表演学理念的强力辐射,足球自身还是一种造星的工具。仍需阐明,足球本身无法造星,但足球可以成为各种媒介的造星对象。在一种健康的足球生态范畴内,球星的作用无法忽略。质言之,足球离开了球星,犹如王冠失去了宝石,足球因此也会失去其既有的光芒。美国学者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特曾经论述过足球之美。“想像一下,你所崇拜的明星正在运球,而对方穷追不舍,随时都可能抢断,然而,还没等对方来得及出手,他便突然做了一个长传,将球传给队友。虽然球就在场内飞过,但是,它落在哪里却无法预测。这时,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全世界都在做慢动作。”^[3]当然,对于



足球之美是体现在足球场还是体现在镜像里,学者们一直呈现出一种见仁见智之态。汉斯赞美过体育的现场之美。“观看体育比赛绝对不是知识分子所称的‘精神愉悦’,也不是沉迷于对往事的追忆。对于体育来说,回忆是次要的。因为体育运动意味着关注现场赛况,只有在场的状态和眼前的赛况才是最重要的。”^[13]汉斯虽然反对体育的回忆之美,却对体育的记忆之美则大加赞赏。“但有一点要肯定的就是一些有关体育运动的记忆深藏于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我认为,他们甚至可以铭刻在我们的血液里。与其说这些记忆在比赛中大多是作为背景存在的,不会通过人们有意唤醒过去而出现,倒不如说,记忆是一种不可衡量的巨大力量给我们的一种突袭。”^[13]汉斯并未在类似记忆、回忆之类的概念中作出穷究,却基本阐释清楚了足球美学的真意。英国知名足球作家尼克·霍恩比曾说:“十分希望这本书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神经正常的人还会这么怀念那种失望的过去。我想任何一个看过阿森纳比赛的人,不管他们追随球队时间的长短,都会怀念海布里的:那两个美丽的装饰艺术派的看台,那条街,以及环绕球场并似乎在掩藏和保护它的那些周遭的房屋……当然,还有属于它们的那些记忆。我们很幸运,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美好记忆都是近年的,没有太多其他足球队的球迷们可以这么说。”^[14]真正的足球美学仍旧需要回忆和记忆之类的心理学因素来重组、推演并加以固化。

竞技体育一向有性别的差异,它不仅构成了同性相斥的竞技学理念,还在更高的层面上扬弃了女性竞技的诸多价值,至少在足球、橄榄球、拳击之类的硬派竞技项目中,男性运动员的市场感召力更强大。质言之,足球更接近男性学的领域,竞技体育原本就是一种针对男性群体的意志、体能、技巧和审美能力的一种训练手段。视觉革命时代到来后,女性开始加大规模地介入足球。尼克·霍恩比曾记述:“在最后一个‘他’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个‘她’字,因为足球,已不再是单纯的男人的运动,球迷中裙裾飘扬已成为球场看台上一道艳丽的风景线,足球的影响不再仅限于喜爱足球运动本身的男人们,它已经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许许多多,几乎很难和球迷形象联系在一起,世界各个角落的男女老少们。”^[14]然而,女性的介入仅仅是出于一种异化的需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男性对战斗类的成功经验都记忆深刻。基于同样的原理,男性对失败的境遇更敏感,失败的记忆会构成一种创伤记忆。任何一位男性都在有意无意地规避失败,因此,回忆或记忆性的足球便成为大大小小的男性足球关注者重构足球镜像的动力。换

言之,男性观众迷恋足球的程度要深于女性,且会将注意力完全投放在技战术的层面,因为包括足球在内的任何一种竞技体育项目不仅会告诉他们成功的经验,更会告诉他们失败的教训。汉斯对此曾作过生动的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亲临现场,或者偶尔在收音机前或是在电视前的感受更强烈(更聚精会神)的了。这些记忆可能在某些比赛时突然冒出,从而增强了它的复杂性,构成了具有优美韵律的乐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它的感受会与日俱增。当我们回忆今天的比赛时,它就会给我们愈加深刻的印象。”^[13]在汉斯看来,最好的足球就是一种值得回忆或正在回忆中的足球。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在评论巴西足球时说:“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15]以回忆来美化足球有其深刻的道理,因为足球的不可预测性很大,而回忆可以过滤掉一些不良的记忆碎片,巩固一下美好的记忆储存。在此意义上看,由回忆或记忆构成的足球同样是一种镜像足球,它是人的大脑合成记忆中图像的产物。于是,一种特别的景象赫然出现,电视足球、网络足球和记忆足球重构了足球的图像成色。足球中的镜像之美因此而显得更为博大,它不仅超越了现场足球的价值,也极有可能超越表演学意义上的足球美学体系,成为一种构建中的不可预测的新型的足球符号。

尚需回归到体育和戏剧的差异点上来。从表面上考量,体育和戏剧的差异在于有无脚本之类的元素,其实不然。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认为:“没有服装和布景,没有音乐配合剧情,没有灯光效果,戏剧仍然可以存在。而且,如果没有剧本,戏剧仍然可以存在。在他看来,戏剧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演员和观众。”^[16]从演员和观众至上的视角来考量,体育和戏剧是完全同一的,而足球和戏剧也有极大的同一性。不妨以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为例。在大多数巴西人看来,2014年是巴西的冠军年,巴西世界杯一定是巴西人拿到大力神杯的示范性过程。换言之,巴西夺冠已经成为诸多巴西人以及热爱巴西足球的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性的心理期待值。人们在心中编制剧本,并期盼真实的赛事按照这种剧本演示下去。然而,巴西并未夺冠,人们在自己内心中编织成的剧本并未在现实社会上演,巴西的失败已成一种铁定的事实。于是,这些虚拟的脚本只能是一种想象。巴西



足球队的失败已经背离了民众在想象中建立起来的脚本图景,变成了一种实情。一场从未发生的戏剧只能在大量观众的想象世界中匆匆收场,而真实的足球结局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生活。

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中可以看出,东道主巴西队显然未能具备绝对性的主导性力量。在世界杯这样裁判水准奇高的场合,凭借东道主优势夺冠的概率并不高。巴西与荷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结束后,鉴于巴西队在主场以0:3负于荷兰队,媒体使用了社会悲剧的概念来表达对巴西队同情与怜悯之情。足球是一种特殊的竞技游戏,大卫·戈德布拉特早已透彻地看到足球中隐含着这种潜在危机。“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5]一个成熟的国家不应该将足球或任何一项体育项目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就如同一个成熟的国家不应当是一种戏剧国家或巫术国家一样。凭借戏剧或巫术思维来断定国家的命脉、裁决人间世事、构建理想王国,或许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娱乐性,却很难帮助这个国家步入现代社会。质言之,戏剧国家或巫术国家有其存在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在现代国家中根本就无法寻觅,因此,现时代的戏剧国家或巫术国家只能体现权力的原始形态,却无法给本国国民带来持久的益处。

2 足球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悲剧形态层面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7]类似世界杯这样的超级大型体育赛事,几乎无法避免地要成为媒体用来营造文化世界的对象。足球本应该是一种较为超脱的文化,但是,偏执的情绪以及强势人物的有意介入会使得足球产生出一种额外的社会负面效力,它甚至会促使整个社会偏离既定的发展轨道,足球自身因此而异化,而异化后的足球对民众的影响很可能比真正的戏剧国家还要更为严重,因为戏剧的本质是虚构,而足球的本质是真实。以戏剧性思维主导国家事宜本

身就有很大的社会和文化隐患。一个崇尚戏剧想象的国家或个人如果仅仅是参与到了国家信仰的建设工程中去,还不失为一种浪漫之举,但绝非理性之道。戏剧性思维等于给足球自身戴上了枷锁,因为它忽视了足球中最为精彩的法系的价值,并使得足球呈现出一种极度变异的形态。足球是需要美学支撑的,但足球的美不应该等同于国家的美,足球的败也不能等同于国家的败。质言之,任何一种简单的一元论的思维方式都只能强化或缔造出一种戏剧国家,并使得国家陷入潜在的危机之中。

为了弱化足球的负面作用,媒体可以定量或定性屏蔽其中的部分信息。也正因为如此,媒体再度获得了巨大权益。在体育界和戏剧界都一样,媒体对戏剧性事件的追求几乎达到了一种不自觉且不择手段之地步。再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为例。《体坛周报》载文分析过巴西输给荷兰的头两个进球皆属误判,似乎在为巴西的悲剧性失利寻找托词。文章不仅将巴西队看成了悲剧的受害者,还将其当成了悲剧的制造者,这便在有意无意间强化了悲剧的内涵,它使得世界杯这样的单线的悲剧朝着复线悲剧的方向发展。巴西作为2014年足球世界杯主办国,对冠军的渴望可以想见。巴西在2013年的联合会杯上拿到了冠军,因此,他们对2014年本土的世界杯冠军觊觎已久,并认为那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1950年的世界杯上巴西就在马拉卡纳足球场的决赛中输给了乌拉圭,断送了雷米特杯之梦。为了举办2014年的世界杯,巴西政府一共投入149亿美元,这笔投资较诸北京奥运会来说要少很多,但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巴西,这样的投资已经达到了极限。巴西政府期望修建场馆拉动经济,同时也想借助在世界杯上创造佳绩,刺激国民精神,缓和社会矛盾。巴西人所设想的佳绩不可能是亚军以下的荣誉,而只能是冠军。张晓舟曾说:“对巴西人来说第二名甚至跟最后一名并无本质区别。在世界杯这样的爱国主义梦幻无敌舞台,面对欧洲豪强,拉美人暴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只会令成王败寇的逻辑变本加厉。”^[8]其实,对东道主而言,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可能会获得一种优势,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劣势,不幸的是巴西这次跌至劣势的一方,陷入了一种自己为自己编织的黑色剧本当中,这种剧本像牢笼一样束缚了巴西足球人的精神世界,并成为导致其连续失败的终极动力。

巴西连创多项耻辱性纪录,球场下的各种罢工示威此起彼伏,而物价飞升、公共交通混乱也给巴西人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巴西人非但未能在本土



世界杯上找回自信,还付出了承办世界杯的一切代价。事后,各国媒体都将这一切看作是巴西的国家层面的悲剧,巴西队也最终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为悲催的东道主。巴西队如果踢得好看但失去了冠军,虽然说算得上是一种悲剧,但仍会获得部分民众的喝彩。如果巴西队踢得难看同样失去冠军,则无疑是一场更大的悲剧,而踢得极为难看,且以极为夸张的大比分失利,则构成了一种世界级的悲剧。这种逻辑在民间、媒体以及国际足坛都完全一样。由巴西人导演的戏剧最终变成了一场十足的悲剧。与2014年巴西世界杯相对应的是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那一届的巴西队输给了意大利队,未能进入半决赛,但那支球队一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人们认为那样的巴西队才是唯一一种符合人类审美需求的超级球队。换言之,那一届的巴西队符合戏剧效应。1982年巴西队的教练是后来被誉为巴西足坛教父的桑塔纳。桑塔纳并未获得过世界杯冠军,但他在巴西享有足坛教父之美誉,且备受尊崇。桑塔纳给巴西带来的只能是喜剧,而非悲剧,其中的缘由值得探究。

足球的本质是悲剧。每一场关键场次的足球赛事都会形成一种死亡象征,类似的事件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悲剧表演。死亡性几乎可以直接触及体育与戏剧的原点。戏剧学家早就关注到了戏剧与仪式的紧密关系。“戏剧与仪式的关系还可以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和2500年前的古希腊等这些古代文化中获得证实。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庆祝主神奥赛利斯的宗教节日仪式活动中,曾产生过所谓‘阿皮杜斯受难剧’,虽然它的性质和内容还引起争议,它也远非近代意义上的戏剧,但它毕竟包含着大量戏剧的因素。而古希腊从庆祝酒神仪式中产生希腊悲、喜剧,则是人尽皆知的。”^[9]当戏剧和仪式的关系得到戏剧学界的普遍认可后,剩下来值得探讨的就只能是戏剧和竞技现象的关系了。其实,竞技体育和仪式的关系同样紧密。“戏剧与体育比赛在古希腊与中国民间仪式中的同源共生并非偶然。因为所有的仪式都是融合语言、动作乃至表情于一体,戏剧与体育在仪式中密不可分,一如舞蹈与武术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密不可分。由于戏剧与体育皆源于再生与死亡之争的仪式,因此,‘赛’不仅是体育运动的主导性因素,亦是戏剧表演的主导性因素。”^[10]大卫·戈德布拉特在讲到巴西足球的独特性时曾说:“足球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一种集体仪式,一种盛大狂欢,更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随着巴西国家

队在世界赛事上斩获冠军,收获如潮的赞美,足球运动在巴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5]大卫·戈德布拉特强调了足球中集体仪式的重要性。足球的悲剧性体现在其竞技过程的各个层面,其中不乏这种对过往事件的怀念因素。

应当承认,一些极端性的结果也是足球竞技的一部分。足球观察家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大卫·戈德布拉特认为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的创造性审美之间会产生矛盾^[5]。巴西人类学家兼作家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非常不幸,2014年的夏天,巴西足球就遭遇到了罗伯托·达玛塔所说的魔鬼之境。拥戴巴西足球的人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这种结局和巴西队的过往战绩反差过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杯和奥运会一样都是罕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盛宴,受到全球瞩目。巴西是唯一一支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曾夺得5次大力神杯和两次世界杯亚军。除了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巴西足球的踢法、巴西的胜利方式和失败都深深地融进了世界足球文化中,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重要的是,远在其他国家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国家名片之前,巴西就证明了这一点。”^[11]阿根廷在决赛中败给德国后,阿根廷本国球迷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教练,纷纷充任悲剧抗争者的角色。由于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在足球场上传统的对立关系的存在,观看决赛的巴西人大多数选择了支持德国。基于艺术足球的天然吸引力,巴西足球在全世界并不缺少拥趸,这种现象展示出人们对艺术足球的高度认同感。中国的媒介同样流露出对艺术足球的偏好情感,署名“左右之外”的网络作者于2014年7月14日发表微博文章《德国“团结紧”小胜阿根廷“严肃活”》,文章中用电影《贝隆夫人》的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为引线,寄托了作者对阿根廷失败的哀伤之情。文章对艺术足球始作俑国度的精神依恋感很强。阿根廷的败落极大地刺激了观者的内心世界,于是,一种哀痛宣泄便难以避免,这种哀痛中寄寓着观者对战者的假想性死亡的哀悼之情。梅西在赛后也将失败的结果稀释为一种艺术品的再造程序,然而,悲剧和喜剧一样都富有传染性,媒体往往体现出对两者同样强的关注度。当人们看到自己心仪的巨星失去荣誉后,悲情替代温情的镜像就会反复出现。



3 足球是一种独立运作出来的悲剧脚本

许多中国观众像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梅西的拥趸一样,带着一种目睹梅西再现马拉多纳神迹的心理来观看2014巴西世界杯决赛中的阿根廷队,其目的在于看到阿根廷夺冠的表演,同时还期待梅西有上佳的表现。然而,阿根廷队未曾做到这一点。阿根廷的落败不仅标志着南美足球的相对没落,还将由足球制造出的悲剧效应扩张到更高的地步,并传输出一种令很多人感到不够圆满的心理。希腊国家剧院院长阿·米诺蒂访问中国时说:“至于悲剧的基础,宁可说它是建筑在神学之上的。……悲剧存在于天地之间,存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存在于人神之间。神是永生的,而人是命定要死去的。神是某种圣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它指导整个宇宙和我们的生活。……当谈到希腊戏剧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撇开哲学范畴的,甚至也脱离不开神学基础。原因即希腊悲剧来自永恒的宗教情感。”^[9]人们观看巴西队和阿根廷队失败后产生的失落之感,是因为此前有贝利、马拉多纳的影子在起作用。但是,世界杯作为全球影响最大的足球赛事,其中的戏剧性更为明显,个别球队几乎扮演着终身悲剧主角的角色。中国观众迷恋梅西,是因为梅西的足球具有极高的戏剧性、表演性和丰富的艺术含量,这使得为数众多迷恋足球艺术性的观众几乎不愿意相信非艺术足球类球队的存在价值,亚洲已经出现了很多艺术足球的拥趸,他们只看欧洲和南美足球,这些观众仅仅相信美的足球是有价值的足球,而欧洲和南美的足球通常可以散发出一种大美的境界。

对许多人来说,世界杯几乎永远是一种荧屏和视频节目,即使一些有条件观看现场足球的人也开始对现场足球产生了排斥心理。现场足球没有慢动作回放,也无近距离捕捉射门镜像的条件,置身现场足球的观众无法选择音量、光线,人们在观看比赛时很难获得机会随意进食,更不可能临时性地选择其他的观看空间。为此,现场足球和镜像足球出现了分野。一些人终生都拒绝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成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及戏剧性、悲剧性的特征。”^[10]就目前的情况看,电视节目取代传统戏剧的地位已成现实,因为电视以镜像表演替代了舞台真人秀的同时,还加入了大量来自媒体采撷到的新鲜的戏剧性元素。这里所说的戏剧指的是仪式学意义上的古代或近代戏剧,那样的戏剧已然步入式微之势。孙惠柱对此有很明确评

判:“从门类来说,百老汇式剧场的演出是和希腊戏剧同宗,但比较起来,今日的戏剧在社会上的边缘角色和当年戏剧的明星地位差得太远了。”^[12]戏剧式微的标志有很多,现时代的戏剧早已失去了原先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又丧失了国家仪式的核心功能,那样的戏剧已然步入式微之势。孙惠柱还站在仪式学的高度重新认定了戏剧的式微的背后缘由,因为在现场戏剧之外还存在一种新型的戏剧。“要说总的人数和影响,电视比希腊戏剧还要厉害得多,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让全世界好几亿人同时看到。”^[12]在此意义上说,电视及网络的权力有强化之趋势,因为它控制了特定群体的公共话语权。戏剧的式微并非一种纯然的悲剧,因为一种东西消隐或亡失,必然有一种新的东西崛起并成为新的权力核心。在戏剧思想家的眼里,戏剧的式微可能是一件好事。“那以后,西方的正规戏剧经过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的500年盛世,终于在公元二千年的最后一二十年里成了强弩之末。中国的戏剧盛世比西方更长,现状也更惨淡。古代的奥运会没有留下多少辉煌的遗迹和史料,但在停止了一千五百多年后,一经恢复就越搞越大,成为和平时人类最大的集体活动。亚特兰大的奥运会吸引了全球一百九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和二百多万来自外地外国的观客。现在许多世界名城都在为争办奥运会费尽心机。”^[12]戏剧与体育的对立,舞台与足球的对立,都呈现出一种权力秩序的高度对应形态。从终极的意义上看,权力是不可能消亡的,权力生长于自然界、生物界,也衍生于人伦社会。权力因此而成为人类秩序的保障性元素。即便在人类世界,权力不仅无以消失,其运作方式也从来不会有太大的变易,人类社会可以改变的只能是技术、方法与具体的设计路径,当技术、方法与具体的设计路径改变后,一种与之匹配的文化就会跟进,成为配合这种方式、方法与具体的设计路径的一种新式的文明形态,因此,人世间最为稳定的便是权力,人类的群体和个体都在为权力而存活。质言之,人无法摆脱权力,权力甚至是人类存在的必然性标志,而足球则是最能体现人类权力的一种游戏形态。于是,戏剧虽然式微了,近乎烟消云散,但一定有一种东西可以在一种特定的时空中成为其替代品,它可能是竞技体育,也可能就是足球本身。“当日常生活中的元素被挑选出来进行重新包装时,只有非常有限的元素被选中,而且一些重要的元素往往被疏忽掉或是有意的忽略掉:重新包装的过程包括对那些已经被选中的元素进行戏剧化的改写的过程,文化商品的推销使侵入并最终破坏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最大化。”^[13]即



便在大众生活的层面,足球自身的观赏价值也类似戏剧。中国足球论者至今仍喜欢用戏剧词汇描述当年的甲 A 或中超。“‘保卫成都’、体能测试、连沪争霸、足球宝贝、双冠王成为 10 年甲 A 中令人激动的时刻。10 年间,甲 A 逐渐式微,最终换了件中超马甲重新登场。人生是一场戏,甲 A 又何尝不是一场戏?遗憾的是,甲 A 似乎是一出哭戏,假球、黑哨破坏了中国足球原本脆弱的神经。”^[14]中国足球论者很少在描述中国本土足球时使用正面性语汇。“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1999 年 12 月 5 日上演的那一幕——当时甲 A 最后一轮重庆隆鑫队主场迎战沈阳海狮队,此役直接关系到当年的升降级结果。中国足协统一规定本轮开赛时间为下午 2 时 35 分,但不知何故,渝沈之战居然在 2 时 42 分开球,整整晚了 7 分钟。一场关系到 5 个队命运的生死大战,开赛时间却如此草率,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也就是这看似无意的延迟让重庆赛场在其他各场比赛纷纷结束之际,还有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海狮在最后一分钟入一球,从而以 2:1 的比分战胜隆鑫,保级成功。这一结果使原本无降级之忧的广州松日队降入甲 B。”^[14]报刊及其他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以戏剧语汇来评述足球赛事现象,这显然是一种新老戏剧文化体系的兴替规律在起作用。詹姆斯·凯瑞曾说:“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明确的宗教起源,而且它也从未完全脱离这一基本的宗教隐喻。”^[7]从电视传播的意义上看,以世界杯、欧洲杯、欧冠为代表的足球赛事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空间中的可供讨论的事件,在特定的时空中,其所引发的传播效应超越了很多文化品类,成为一种新型的主导型文化力量。

且以世界杯为例。世界杯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同的人对世界杯的意义诠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女性观球人柳延延认为:“世界杯的意义也在于,它让人们关注人生的艺术化的方面,提醒我们不能为了挣钱而忘掉自己对幸福、快乐和美的追求。”^[15]自由撰稿人沈宏非认为:“世界杯的意义是,营造一种逼真的战争氛围,经由卫星转播,让全球 60 亿不同国族的电视观众在限定的 30 天里暂时结成一个关于世界大战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充分发挥各自的战争想像,尽情发泄各自的民族情绪——说出来,喊出来,你就好了,就消停了。体育比赛本来就是消解的游戏。”^[16]足球评论员汤宪博认为:“世界杯的意义和重要性早已超越了足球的界限,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社会、娱乐、音乐、传媒、时尚文化等都在其影响的辐射范围之内。”^[17]一种由几百个球员参与而成的足球世界杯竟然激发起世界

上如此多人的关注,产生出如此多的歧义,这种现象再度印证出世界杯的特别价值。质言之,世界杯已经成为一种足以抗拒任何一种大型宗教的社会表演现象,每一个生活在其真实或想象的场域空间的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活力辐射。

世界杯的影响力之大,已无需过多论证,需要论证的是足球自身的自在性、自为性和自发性价值。作家王干已然意识到足球使用脚的独特价值,并认为足球中蕴藏着一种返祖性元素。“足球只是以返祖的方式出现的重新恢复脚的功能的一种运动而已,真正对人另一半的开发自然不会停留在这样的初级阶段,更重要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也不是一两天、一两个世纪才可以见成效的,而且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在于人不能忽视脚的潜在未知的价值。而现代足球又差不多是与汽车工业同时出现的,就更表明人的潜能开发的必然。”^[18]许多普通球迷之所以迷恋足球,就在于足球中蕴含有一种超越常态的奇异的景观。如果说足球是一座金山,那么,世界杯就是一座迷宫,人类世界中为数众多的男性会为此迷醉,而其催生出的诸多的反社会性的怪相则构成了足球世界另类奇观。

如果没有浩大的场地做为球员飞奔的空间,足球的美学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当足球的诗意丧失之后,足球自身的魔幻力量也将会消弭殆尽。这是足球存在的危机,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从终极的层面看,足球中的诗意架空了其真实的对抗性,而足球中的古典性蕴藏在其对人性本真价值的绝对尊崇方面。足球由此而在观看者和表演者之间早已架设好一道桥梁。足球的终极意义或许仍是一场悲剧,因为在足球的巨型游戏场域内,没有人可以永久性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足球中的诗意的成分淡化了其绝对悲剧化的内质,它使得足球缔造出来的文化镜像柔和而平稳,足球由此而充满了济世的力量,其中也不乏超然的虚幻精神。足球就是这样,它亦正亦邪,非敌非友,是天堂也是地域,是精灵也是魔兽。质言之,足球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糟糕。足球可以使得人变得内心纯净,也可以使人变得精神错乱。足球的本性并非一种足以使人的灵魂变得通透晶亮的物质,它只能是一种再造性的用于平衡人类社会的力量。人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仅仅是对足球的继续性的留恋。从观剧学的角度看,人只能是一个游戏者、游玩者和游猎者,因此,深度迷恋足球的人只能永远浸润在足球中,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精神的神圣虐待。由此可见,足球的悲剧性仅仅是在无休止地戕害那些热爱足球的人,它揭示出



人的本质以及世界存在的意义。足球是一种原罪的制作人,也是一种极乐世界的奉献者。足球在替代悲剧、宗教与死亡祭祀方面的功能依然十分强大。足球就是这样,它存在于世,因为它宛如一种永世不灭的精神彼岸。

4 结语

人的解放是一种隐喻,而人受到另外事物的钳制也会构成一种喻体。足球的存在形态和体育的存在形态一样,它们都一度拥有过极度温和的品质。在一种浮泛而草率、寻常而平静的世界里,足球被理性地划分到了学院派、社会派和竞技派的领地,然而,足球进入大众视野后便立即展示出其作为人类超级的动作形态的绝对主导性能量。足球自身有一种针对人类精神的高强度的清零功能。足球的绝对理性因此也具备了超越其体育学意义的价值。足球竞技一向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足球无论如何推演变化,都永远难以更改其作为具体可感的生物性行为之基本事实。足球并非一种抽象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感性化的社会存在。足球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流派,而由于受到其规则体系的限定,足球正朝着一种为世界各国观众共同认同的镜像系统发展,足球的共性已然超越其个性的层面,而足球的死亡寓意、悲剧情怀、权力演化之类的元素直接决定了其作为新兴分裂型宗教的超级能量。

参考文献:

- [1] [美]理查·谢克纳(Schechner R).从仪式到戏剧及其反面:实效-乐二元关系的结构/过程.黄德林译.引自[美]理查·谢克纳,孙惠柱.人类表演学系列:谢克纳专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85-186.
- [2] 方千华.竞技运动表演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82.

- [3] [美]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特.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M].丛明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9.
- [4] [英]尼克·霍恩比.极度狂热[M].沙迎风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7,5.
- [5] [英]大卫·戈德布拉特.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M].搜达足球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15,16,13,16,16,8.
- [6] [波兰]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的戏剧[M].魏时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5.
- [7]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 [8]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M].张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
- [9] 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M].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8,40-41.
- [10] 汪晓云.人类学视野中的戏剧与体育[J].戏剧艺术,2016(4):15.
- [11]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7.
- [12] 孙惠柱.游戏与竞赛——戏剧和体育的联想[J].戏剧艺术,1997(1):38,38-39,39.
- [13] 马希敏.大众传媒构建的“拟态”体育环境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9:83.
- [14] 刘广迎.黑白足球:关于中国足球问题的思考[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32,132-133.
- [15] 柳延延.世界杯:人类最好理念的展示[N].文汇报,2006-07-10.
- [16] 沈宏非.思想工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59.
- [17] 汤宪博.足球场进行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67.
- [18] 王干.青春忧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3.

(责任编辑:陈建萍)